



# 由多元文化主義探討靈性照顧 社會工作在台灣的可行模式

劉珠利

## 壹、前言

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意指能夠接受多元的世界觀(multiple worldviews)，也就是接受人類是因為他們自己所生活環境的獨特歷史背景、文化與社會經驗，所建構出的世界，以及了解世界或是身邊事物的方法(Sue, Carter, Casas, Fouad, Ivey, Jensen, LaFromboise, Manese, Ponterotto, & Vazquez-Nutall, 1998)。因此，要教授、學習、與實踐多元文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培養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就是第一要務(Fellin, 2000)。所謂文化能力，具體來說就是“協助不同性別、社會階層、宗教或是靈性信仰、性傾向、年齡、與失能狀況的人所需的技能、知識、或是價值觀”(NASW, 1996)。西元1996年，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簡稱NASW，以下將以簡稱代表)對文化能力所下的定義之中，在過去所沒有的靈性

(spirituality)的角度已經被納入其中，這樣的轉變是有其原因的。Sheridan (1992)對這樣的轉變提出說明，他整理了許多早年社會工作著名學者的文獻，例如：Biesteck, Goldstein, Siporin 等人的著作發現，這些學者都認為重視多元文化對於社會工作實務是一個重要的角度，然而宗教卻是被他們摒除在多元文化的角度之外的；Sheridan 同時也檢視美國社會工作的歷史發現，雖然社會工作是從宗教慈善精神中發展出來的，但是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因為重視科學以及向「專業化」靠攏，所以失去了宗教的色彩，直到西元1980年代之後，才又開始找回宗教的精神，甚至在西元1990年成立 National Society for Spirituality and Social Work (Sheridan, 2004)。為什麼在西元1980年代之後，又開始找回宗教的角度呢？Fukuyama and Sevig (2004)認為當社會工作的研究擴展至了解美國的非洲裔、墨西哥裔等人民之後，以及大量移民進入美國社會之後，才意識到靈性/宗教在這些族裔文化中是一個重要的信念，因此靈性/

宗教的取向才加入了多元文化的定義之中。這些因素促使了 NASW 將靈性角度納入多元文化的定義之中。Fukuyama and Sevig (2004)甚至認為，唯有關注靈性的角度，多元文化的訓練才得以提升，足見靈性的角度在西方受到重視的程度。

靈性/宗教角度廣被重視的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所簽署的法案。西元 1996 年美國通過的 1996 年個人責任與工作機會調解法(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Work Opportunity Reconciliation Act of 1996)中確定了宗教與社會服務合作的條款(Charitable Choice Provision) (Cnaan & Boddie, 2002)，在前總統布希的主導下於西元 2001 年啟動了信仰基礎的社會服務模式(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 initiatives)，具體的作法就是立法讓宗教機構或是採用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機構，可以向聯邦政府爭取經費，同時也鼓勵公私部門基金投入宗教與社會工作協同合作的社會服務(Saxon, 2004)。但是聯邦政府的經費並不補助宗教的崇拜儀式(worships)或是任何的法會及佈道大會，也不補助勸說加入宗教(Tangenberg, 2005)。

筆者在搜尋圖書館西方電子資料庫的文獻資料中也發現，近年來西方已經有不少文獻資料討論以靈性/宗教的角度來幫助案主，同時西方也已經產生一份專門討論靈性/宗教的期刊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足見這個角度不光只是被重視，甚至已經發展成一個概念極為龐大的取向。

反觀台灣的社會工作實務，似乎也可見相同的發展足跡。台灣原本是一個種族不多元的社會，數百年來除了原住民以及不同時期從中國大陸移居台灣的人之外，鮮少有其它民族移入台灣社會。自從外籍配偶與大陸籍配偶在台人數不斷成長之後，台灣才逐漸朝向多元文化的社會邁進，也因為外籍與大陸配偶的移居台灣，台灣的社會工作領域才開始關注多元文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根據筆者的觀察，早期台灣的社會工作，因為局限於關注大陸籍、外籍配偶、以及台灣的原住民，所以認為對不同文化的了解，就是多元文化實務工作的全貌，後來經由不斷的討論，才開始關注不同社會階層、不同年齡、及不同性取向的能力。台灣社會工作實務界較為熟悉的定義是：多元文化能力是一種了解來自不同性別、社會階層、文化、與性傾向的能力，而了解不同靈性或是宗教信仰的人的能力，就鮮少被提及。當筆者注意到西方多元文化定義的修正之後，也開始思考靈性照顧這個角度是否適用於台灣？實務上應該要如何操作呢？在台灣，又應該如何操作呢？

有鑑於此，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在於整理探討多元文化實務之中的靈性/宗教的角度以及實務操作的文獻，整理出西方靈性照顧實務工作的方法、優缺點、特殊考量等。除此之外，本文的第二個目的，在於探討西方靈性照顧實務工作取向，是否適合台灣？是否有必須調整之處。本文第三個目的在於對台灣的社會工作界，提出靈性照顧實務工作可行模式的建議。本

文除了對於撰寫本文的背景加以說明之外，以下將分別討論：西方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實務、台灣社會是否適合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實務？是否有需要調整之處？本文最後將根據各段落的討論，提出以靈性照顧為基礎的社會工作可行模式建議，提供台灣社會工作實務界參考。

## 貳、靈性照顧社會工作

非洲裔文化是最強調靈性的文化，在這個文化中，所謂「靈性」意指宇宙當中看不見的物質，而這個物質可以將人們結合在一起，也可以將人們與偉大的神連結在一起(Schiele, 1996)。當這個概念逐漸成為研究與實務工作的主題之後，一些學者開始提出靈性在學術上的定義。Canda and Furman (1999)定義靈性是一種人類尋找意義的方法，是一種道德的架構，是一種處理自己和他人關係的方法。Funderburk and Fukuyama (2001)定義靈性是一種尋找價值觀的方法，是一種人類和超自然能力之間的關係，而人類靈性活動最普遍的表現方式就是宗教信仰。Connor, Davidson and Lee (2003)則定義靈性是一種超越個人存在、能夠連結宇宙並穿越日常生活事物的力量，他們也認為宗教活動就是靈性活動的型式之一。綜合前面數位學者的定義可以發現，宗教信仰、尋找意義(meaning making)、以及人類和自然/超自然的關係是大家共同都會提到的定義，因此本文就以宗教信仰、尋找意義(meaning making)、以及人類和自然/超自然的關係作為靈性

的定義。重視靈性的文化認為，由於人類過度重視物質而忽略靈性的需要，所以才會產生暴力、物質濫用等的不恰當創傷適應(coping)問題。而療癒這些問題的方法，就是將靈性與人類其他部份一樣重視，使得人類成為一個完整的個人。Freeman (2001)也指出，當一個人經驗到危機或是重大的失落事件時，這個人就會開始質問自己以及自己的世界觀，例如：許多人就會質問“為什麼是我？為什麼這件事會發生在我身上？”事實上這樣的質問就是來自靈性層面的質問，亦即靈性的層面開始尋找痛苦或是受苦的意義，而經由這種找尋意義的過程，人們可以和外在世界的經驗整合，找到生命的價值。

筆者整理西方有關靈性照顧社會工作的文獻發現，大約可以分為兩大主題，一是在社會工作直接服務過程中加入靈性的處遇方式(spiritual interventions)，另外一個就是社會工作在以宗教為主旨的機構組織中實施或是與此機構進行方案的合作。本文就以這兩大類作為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實務的內容。

### 一、直接服務的靈性處遇方式

Sheridan (1992)是率先提出靈性/宗教處遇方法的學者之一，他認為這類型的處遇方法計有：收集案主的宗教信仰資料、運用或是推薦宗教方面的書籍供案主閱讀、和案主一起禱告或是靜坐冥想、在會談過程之中運用宗教相關的概念、協助案主澄清自己的宗教價值觀、推薦案主參與某些宗教活動、轉介案主前往和宗教師會

談等。劉珠利(民 96 年)整理了一些作者所提出的靈性社會工作實務,或者是靈性照顧的社會工作處遇方式,發現包括下列數種方式:宗教與認知治療結合的處遇方法、在機構中規劃出屬於文化或是宗教的空間,讓助人的會談、諮詢等在這個地方進行、以及與宗教人士協同合作共同幫助案主。

就前述的幾種方法之中, Sherian (1992, 2004)與 Heyman, Buchanan, Musgrave, and Menz (2006)的研究都相同指出社工員運用最多的方法是收集案主的宗教信仰資料,其次是協助案主澄清自己的宗教價值觀,第三則是在會談過程中運用宗教相關的概念,而最少被運用的方式則是和案主一起禱告或是靜坐冥想,倒數第二少被運用的方式則是轉介案主前往和宗教師會談。Stewart and Koeske (2006)運用 Sheridan (1992)所列出的靈性處遇方式,了解位於美國東南地區的一所社會工作學系的大學部與研究所的學生對於運用靈性處遇方式的態度,結果顯示,這群學生認為可以接受的靈性處遇方式前三種分別是:轉介至類似戒酒匿名團體的方案、收集案主的宗教信仰或是靈性相關的背景資料、以及轉介案主給宗教師會談;而參加驅魔儀式、或是運用觸摸案主進行治療的宗教方法,則是不能接受的方式。這一份研究同時也顯示,當學生本身愈具有靈性或是宗教的信念,則愈同意運用靈性處遇的方式協助案主。前述的幾份研究可以看出,目前社會工作界能夠接受的靈性處遇方式,還是以社工員在與案主會談過程中收

集宗教背景或是加入宗教的概念(包括閱讀書籍及討論宗教觀念);以及轉介案主相關的宗教資源(包括轉介宗教團體提供的支持方案、以及轉介宗教師會談)為主,而社工員本身是否相信靈性是一個對人具有重要影響的角度,是影響社工員是否採取這個處遇方法的因素。

靈性處遇的方法是否有效呢? Sherian (1992)認為,在收集案主資料時,若只是了解案主的宗教信仰種類,是沒有任何效益可言,如果收集案主宗教信仰資料要達到協助的效果,社工員還需要更進一步的了解:案主的宗教信仰,跟目前所遭遇的困難,有何關連性?在遭遇困難的時候,案主是否也嘗試閱讀一些宗教的書籍或是經典、禱告、冥想等方法來幫助自己?宗教信仰在案主生命中的意義為何?詢問這些問題可以具體了解案主特殊的態度與做法。Hodge (2005)的研究結果也呼應了這樣的結論。Hodge (2005)認為,靈性/宗教的處遇方式提供了解、修正、擴大案主認知的管道,並且宗教機構也提供了極大的社會支持力量,這都是靈性處遇方式有效的原因。

靈性處遇的方法對何種標的人口較有效呢?雖然目前西方文獻大部份都提到這個角度對於受到天然災害的受害者、罹患重大疾病的案主、戒毒中的青少年及老人最有效,但是近年來已有幾篇文獻指出,靈性處遇方式對於家庭暴力加害人或是受害人,是有助益的(Freeman, 2001; Ringel, 2008)。Freeman (2001)針對家庭暴力的加害者的實證研究就指出,如果加害者愈有

意願探索靈性層次的議題，就愈不會使用肢體暴力來處理問題。實證研究證明靈性處遇方式對於前述幾種標的人口有效，但是依照這個方法不斷的被社會工作者運用，不斷有實證研究結果發表的趨勢來看，未來這個方法所能適用的標的人口，將會更多元。

在美國並不是所有的社工員都同意運用靈性處遇方式，一些社工員的最大疑慮就是將靈性/宗教的角度加入協助案主的過程之中，是否違背社會工作的價值觀？根據美國蓋洛普(Gallup Poll)的調查顯示，一般民眾普遍認為，宗教對於人們相信自己是否能從疾病中復原，有極大的影響(Sheridan, 1992)。所以從優勢觀點的角度(strength-based perspective)而言，案主的靈性/宗教信仰可以說是案主的優勢的一部份，因此靈性處遇方法不但不違背社會工作的價值觀，甚至對於來自重視靈性的文化背景的案主而言，例如：原住民或是非洲裔的案主，加入靈性/宗教的處遇方式，才是協助這類案主的優勢觀點做法。Sheridan (2004)的另外一篇研究指出對靈性/宗教層面抱持正向態度的社工員、面對具有濃厚宗教色彩、且在會談過程中不斷提起宗教的影響的案主、以及自己本身也經常參與宗教/靈性活動的社工員，才會採用這種處遇方式。亦即，和案主提起宗教或是運用它幫助案主，並不是將自己的價值觀加諸在案主身上，而是一種案主中心(client-centered)的做法。Sheridan (2004)認為社工員在運用靈性處遇方法之前，是否是案主同意與案主決定的？這才是應該考

慮的重點。除此之外，Sheridan (2004)認為和有宗教信仰的案主，討論宗教的信念與影響，甚至和案主討論宗教的處遇方式，除了是一種案主中心的處遇取向，也是尊重案主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表現。因此對於靈性處遇方法實務操作過程來說，有幾個條件是相當重要的，那就是：案主有意願、案主在會談中主動提起靈性/宗教的影響、案主自己要求/決定要將靈性/宗教納入處遇過程之中，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才是社工員採用靈性處遇方法協助案主的時機。

社工員的另外一個疑慮就是：運用這樣的處遇方式之前，是否應接受過相關的專業教育？這是有必要且是許多學者目前極力鼓吹社會工作教育的課程應該要包括的。筆者在檢視北美洲幾個在社會工作領域中，頗富盛名的學校的課程中都發現，靈性照顧的課程，已經列在它們所提供的選修課程之中，如果台灣的社會工作實務界想要採用這個工作方法的話，台灣學校的社會工作專業養成教育過程中，就必須盡快的將這個課程加入選修課程的行列。

## 二、社會工作在以宗教為主旨的機構組織中實施或是與此機構進行方案的合作

社會工作與宗教機構組織合作則是美國靈性照顧社會工作的另外一種方法。Tangenberg (2005)根據宗教在社會福利組織中的角色，將美國的社福機構分類為以下數種：1.以宗教為機構宗旨的組織(faith-permeated organizations)—這類型組

織有非常明確的宗教任務，甚至在挑選工作人員或是機構的管理階層人員時，有非常明確的宗教是挑選標準，同時拒絕任何要求他們改變宗教主旨的經費資助；2. 以宗教為中心的組織(faith-centered organizations)—這類型組織雖然有明確的宗教主旨，但是並未要求工作人員或是經費資助來源，必須與組織的宗教信念一致；3. 宗教相關連的組織(faith-affiliated organizations)—這類型組織不一定有明確的宗教主旨，但是經費的來源是信徒的捐獻，也期望工作人員是他們宗教信仰的人；4. 宗教背景的組織(faith background organizations)—這類組織僅有隱含的宗教主旨，和其他宗教組織的聯繫並不多，經費來源也多元，對於工作人員的宗教信仰並不要求；5. 宗教和一般社會福利合作的組織(faith-secular partnership organizations)—在這類型合作關係中，一般社會福利工作人員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但是必須尊重宗教機構的工作人員，宗教機構可能是整體合作關係中經費或是其他支持的來源。前述的機構都是美國法案中，具有申請社會福利經費資格的機構，前三種機構的宗教色彩非常濃厚，而後兩種的宗教色彩並不明顯，甚至社會工作的色彩超過宗教色彩。

當美國通過前述的法案時，在當時的社會工作界造成不小的震撼與反彈，尤其是前三種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機構具備申請社會福利經費的資格，更是引起反彈。許多社工員反彈的最大原因在於感受到工作備受威脅，甚至質疑社會工作專業化是否會因此而瓦解。面對這樣的反彈與質

疑，Tangenberg (2005)的思考倒是值得作為參考：Tangenberg (2005)認為社會福利機構和宗教機構協同合作，滿足案主的需求，是一項好事，如果從生態系統理論來檢視案主所生活的環境，宗教機構絕對是案主生活環境的一環，既然社會工作強調人在情境中的理念，那麼為什麼社工員自己卻不能接受和能夠滿足案主的需求、也是環境中的一部分、而且具備協助案主意願的機構合作呢？但是重要的是，在合作過程中，社工員必須要堅持對案主提供沒有歧視、符合倫理要求、符合社會正義、及有效的社會服務。這個觀點值得社工員用來探索自己的態度。

綜合直接服務處遇方式、以及機構組織的方式兩部份的討論，筆者認為這些文獻提醒我們，應該要認可靈性層面是人類或是所有案主的需要，只是有一些案主這方面的需要不明顯，有一些案主這方面的需要非常明顯，例如：受創傷的案主這方面的需求就非常明顯；照顧案主的需求，原本就是社會工作的使命，目前社工員習慣於提供協助滿足案主的經濟、安全、居住、娛樂、生命週期任務的需求，而將案主的靈性需求排除在外。如果我們仍然企圖讓社會工作對案主的協助更為全面，現在是我們該將靈性照顧的角度納入社會工作實務的時候了。

### 參、台灣社會是否適合採用靈性照顧的社會工作？

西方靈性照顧的實務工作源自研究者

發現，非洲裔或是來自於南美洲的移民對於世界或是事實的看法、生病該如何治療等的問題，有一套不同於西方信仰基督教的白種人的看法。非洲裔的人民非常注重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或是相互依賴的關係(interconnection)，相信大自然之中存在看不見的超能力，相信人和超能力之間可以相互影響(Fukuyama & Sevig, 2004)。如果我們想要探討，台灣社會是否適合採用靈性照顧的社會工作，就必須先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台灣人是否注重人與大自然之間的和諧或是相互依賴的關係，相信大自然之中存在看不見的超能力，相信人和超能力之間可以相互影響？宗教在台灣人們的生活中，是否具有影響力？

這方面，筆者嘗試從兩個角度來檢視，一是從台灣人/華人所相信的一些哲學思想來檢視，另外一個角度則是從宗教信仰目前在台灣是否盛行來檢視（因為宗教是靈性層面的具體落實）。

儒家與道家是華人文化的兩大思想，簡單來說，儒家思想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道家或是老莊思想則是強調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Yip (2005)指出，道家或是老莊思想影響華人社會頗深，影響的實際面就是表現在華人的飲食或是服用藥物方面，華人相信在不同的節氣與時令，應該吃或是不吃某些食物，這就顯示出華人相信人和大自然之間是有互動與相互影響；同時這個信念也使得華人相信人要有順應自然的態度，人和大自然之間才能達到和諧。道家或是老莊思想使得華人相信人和大自然、超自然之間，有著密不可分

的關係。這樣的信念即使在現代，還是華人生活態度/實踐的一部分。

宗教信仰的狀況，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台灣人對於靈性方面的態度。瞿海源（民 88 年）指出，台灣社會解嚴、進入民主時代之後的特色之一，就是宗教的多元化以及宗教影響力的增加。根據中華民國統計網（民 98 年 b）的各縣市各宗教統計數據顯示，民國 97 年全台灣的寺廟數共有 11,762 間，信徒人數有 953,211 人，教堂共有 3,184 間，教徒人數共有 548,910 人。從前述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台灣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超過 150 萬人，其中又以佛教或是民間信仰人數居多。由於這是屬於官方的統計資料，是以各地民政局登記的資料為主，筆者相信有宗教信仰或是具有宗教信念的人數，遠較這個數據為多。舉例來說，從台灣三大佛教團體—法鼓山，慈濟，以及佛光山所舉辦的活動時參與的人數，以及他們建立的電視頻道的收看人數來看，都是無法精確計算的人數，因此筆者相信，台灣具有宗教信仰或是信念的人數，絕對比登記的人數為多。這個數據也可以讓我們了解到，社工員在實務上所面對的案主，為數不少是具有宗教信仰的，而且可能以佛教或是民間信仰的人較多。這個數據也讓我們了解到，如果台灣的社會工作實務界要討論如何進行多元文化實務，宗教是一個不能缺少的角度。

筆者在找尋台灣人是否重視人與大自然、超自然關係的資料過程，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統計數字。根據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民 98 年 a）的宗教社會服務概況統

計顯示，民國 97 年台灣共有 69 個社會福利基金會、以及 137 個社會服務中心是由宗教所成立的；社會福利基金會中，其中的 61 個是由寺廟（包括佛教、道教、軒轅教等）所成立，8 所是由教會（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等）所成立；社會服務中心中，86 所社會服務中心是由寺廟所成立，51 所是由教會所成立。從這個數據有可以看出，在台灣佛教或是民間信仰的宗教，積極加入社會服務的意願很高，天主教、基督教則是居次。這一份統計資料僅呈現最基本的次數分配狀況，筆者無法對於統計中的社會福利機構的宗旨或是實際運作狀況加以深入的分析，因此無法對照前述 Tangenberg (2005)根據宗教在社會福利機構的角色而對社福機構所作的分類加以比較，從而討論台灣由宗教所資助成立的社會福利機構的性質，但是這一份統計數據可以顯示，在台灣，許多宗教已經資助或是加入社會福利的行列。

綜合前述的討論，台灣文化中也有重視人與大自然、超自然之間的關係的部份，靈性照顧不但是台灣案主所需要的，靈性照顧同時也是台灣案主可以接受的處遇方式之一，台灣的各個宗教已經開始加入社會福利的行列。如果靈性處遇方式應該成為台灣社會工作直接服務處遇方式之一，接下來的問題就成為，社會工作實務中，如何加入這個要素？西方的靈性照顧處遇模式在台灣是否可行？是否需要調整？筆者認為如果參考前述西方研究者 Sheridan (1992, 2004)等人對於靈性處遇方法的分類，如果是和案主在會談中一起討

論宗教的概念及其對生命問題的影響，一方面牽涉到社工員的專業養成中，並未有這方面的訓練，另外一方面台灣的社會工作界對於案主靈性層次的照顧概念尚未成形，因此這種做法在現階段較不可行。筆者認為現階段台灣社會工作實務界，尤其是直接服務的部份，比較可行的是轉介案主給宗教師，和宗教師以團隊合作的方法協助案主。

#### 肆、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在台灣的運用——跨專業協同合作模式

既然台灣的社會形態已經可以接受也需要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實務界現階段可以以和宗教師合作的團隊合作方式共同協助案主，那麼這個跨專業的團隊應該考慮什麼？如何形成合作呢？台灣目前的社會工作實務界，和宗教建立起正式的協同合作關係，僅有醫院的安寧照顧或是共同照顧，共同照顧病人面對重大疾病以及死亡的問題。在安寧照顧的跨專業合作中，社工員是以社會工作中的個案或是家族聯合會談的方法，協助案主及其家庭，會談的技巧以傾聽、同理、關懷、提供社會資源為主；宗教師除了傾聽、關懷、陪伴之外，還加入了許多宗教的方式，例如：念佛號、皈依、生命回顧等的方式（釋宗惇、陳慶餘、釋惠敏，民 96 年）。這樣的協同合作方式，社工員和宗教師協助案主的方向是有不少重疊之處。雖然目前大家對於工作重疊之處並無異議，認為對於病人的安寧照顧盡一份心力即可，但是筆者認為，如



果要將這個協同合作模式擴大至其他問題類型的案主，例如：家暴受害者，甚至是貧窮的議題，勢必就需要清楚的分工。所以要討論協同合作這個議題，筆者認為應該從最根源的觀念討論起，要先了解跨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定義、與方式。

社會工作與其他專業形成合作，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例如：學校社會工作人員與醫療或者是其他機構合作，提供兒童及其家庭完整的服務；在二十世紀初，在醫療體系工作的社會工作人員開始和醫生、護士以及其他人員合作，以確保病患以及家人能夠了解醫生的意見、並且從心理社會角度(psychosocial)幫助病患維持醫療的效果，也同時在精神醫療領域中從人在情境中的角度幫助病患，這些都是社會工作歷史中已經行之多年的跨專業合作的實例(Allen-Meaers, 1998; Bronstein, 2003)。西元1990年代開始，世界的思潮就開始傾向認為沒有那一個專業具有獨霸或是凌駕其他專業的知識、技術、或者是專長(Quinney, 2006)。因此從不同專業領域提供案主服務，就形成一種趨勢，因為跨團隊的合作才能夠滿足案主的需要(St.Joan, 2001)。

Quinney (2006)以及 Bronstein (2003)都指出，跨團隊合作除了是不同的專業以及機構間的合作之外，跨團隊的協同合作(collaboration)還包含將不同專業的知識、技術、與價值運用於實務工作；更仔細來說，跨團隊合作就是意指，案主的問題是需要不同專業間的合作與貢獻，才能有效解決的；這樣的合作可以在不同的層級上操作，例如：機構組織的層級上合作、團

體的層級上合作、或者是不同專業的個人的層級上合作。Walsh, Brabeck, and Howard (1999)則採用更為嚴格的定義，就是專業之間的互動過程，彼此分擔責任，彼此都可以控制決定以及行動的方向，彼此有共同的目標與價值，亦即，案主的問題是所有的觀點都被考慮之後，才作出預估及採取行動。

Bronstein (2003)對於如何架構跨專業的團隊合作，提出了一個架構模式，在這個模式中，包含五個元素，分別是：

1.互賴(interdependent)—意指專業之間要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方法不斷溝通，例如：以書面記錄的方式溝通。

2.創造新的專業活動/處遇(newly created professional activities)—不同專業共同創造出不同於以往的专业處遇方法或是合作結構。

3.彈性(flexibility)—專業之間由於要清楚劃分界限有時候很困難，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有一些較為彈性的做法，在過去最常見的就是在緩和治療專業團隊中，資深的社工員有時候也會代替醫護人員回答一些較簡單的醫療問題。

4.集體共同目標(collective ownership of goals)—意指不同的專業都必須同意採用案主中心的目標，共同協助案主。

5.反省過程(reflection on process)—專業同仁須不斷的反省不同專業合作的優點、缺點為何？合作的關係為何？作為改進協同合作模式的基礎。

跨專業合作雖然可以達成效果，但是同時也產生許多的挑戰，Bronstein (2003)

指出，成功的跨專業合作的要素包括：專業價值觀與專業倫理較相近的職業間的合作較容易成功、組織結構支持跨專業合作、合作的兩方願意尊重對方並願意與對方形成良好的溝通，這些因素缺一不可。

Colarossi and Forgey (2006)認為跨團隊的合作的成功需要彼此對於角色的界限有清楚的概念、對於角色衝突具有解決的能力與技巧、對於協同合作要有正向的態度等。眾多學者的看法不外乎要提醒大家，跨團隊合作雖然可以達成全面的效果，然而其中也可能帶來破壞性的結果，唯有不斷溝通與了解，才是成功之道。

筆者仔細分析 Bronstein (2003)所建議的架構元素，認為其中互賴、集體目標、反省三項可以歸類為協同合作必須先行建立的（書面）規則部分，創造新的專業活動以及彈性的部分，則是協同合作的過程部分。因此根據前面有關協同合作文獻所討論的跨專業的專業價值觀、專業人員角色界限與角色衝突、專業間溝通等議題，以及 Bronstein (2003)所建議的架構元素，筆者自行創造出以下社會工作人員以及宗教師（註1）協同合作的模式：

### 一、協同合作模式的工作人員部分

（一）社工員必須先行對自己對於宗教信仰的態度有深度的探索，釐清自己是否對於宗教信仰或是某一些宗教信仰有偏見。如果社工員本身不相信宗教或是靈性的影響力，或者對這個角度有所偏見，就不適合加入這樣的協同作模式。

（二）願意採用靈性照顧處遇方法的

社工員，最好是有此宗教信仰的社工員。

（三）願意加入這個協同合作模式的宗教師，必須是具備開放心靈、願意接受和不同專業合作並協調差異、願意自我探索的人。

### 二、協同合作模式的訓練及合作規則

（一）在靈性處遇模式使用之前，社工員應該和宗教師一起接受訓練，內容包括：互相了解社工專業與宗教分別如何協助遭遇困難的案主？社工專業與宗教對於將要共同協助的案主問題，例如：家庭暴力、性侵害、災難等，社工與宗教的教義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與態度，分別是什麼？針對一些特殊議題，例如：因果輪迴的議題，宗教教義中是否涉及兩性不平等、宗教的處遇方法是否令人恐懼，例如驅魔或是碰觸案主身體的議題等，展開兩方的對話，直到達成共識；針對合作的方式、各自的角色等展開對話，達成共識。

（二）建立合作的結構，包括轉介原因的範圍、記錄表格、個案協調或是研討會的次數等，須先行規定清楚。

（三）協同合作的標的問題包括：天然與人為災害、重大疾病、成癮問題、家庭暴力、性侵害、失落等。

### 三、協同作過程

（一）就合作方式上，以案主的問題種類、時間先後順序等，開始架構。例如：案主應該先由社工員先行與之會談，釐清案主的問題種類，然後由社工員先行處理案主的需求的問題，之後，如果案主在靈

性層次的需要上無法走出，例如：案主仍然在“爲什麼是我發生這種問題？”的問題上無法釋懷，可以由宗教人員接手與案主會談這樣的問題。

(二) 事先取得案主同意與案主相同宗教信仰的宗教人員會談，是很重要的倫理守則。在和宗教師會談過程中，宗教師不可以極力遊說案主加入宗教組織或者會談後參與任何宗教活動之中。

## 伍、結語

靈性是人類需求的一部份，也是NASW定義中多元文化的一部份，因此社會工作實務中加入靈性的角度是必要的。由於在過去靈性的角度鮮少提及，學校專業養成或是在職訓練中，靈性的課程並未加入社會工作的教育之中，僅有一些學者

開始從事靈性方面的研究，因此現階段台灣以社工員和宗教師協同合作，從事靈性照顧是比較可行的模式。筆者參考西方有關靈性照顧與協同合作方面的文獻，提出社會工作與宗教師協同合作從事靈性照顧的模式，包括協同合作模式的工作人員部份、訓練及合作規則、以及協同合作過程的要素，期望能夠開啓台灣各標的人口靈性照顧社會工作實務。

最後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工作實務如果要加入靈性照顧的部分，還需要投入更多的相關研究，並且在學校專業養成教育中，開始開設相關的課程，才能讓未來要投入社會工作行列的人，具備相關的知識與技能，照顧案主的靈性需要。

(本文作者現為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

## 註釋

註 1：根據前面所討論的宗教教義，筆者所指稱的宗教師，係指佛教、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僧侶與神職人員。

## 參考文獻

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 (民 98 年 a)，**宗教社會服務概況**。Available online: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76&CtNode=3684>. Retrieved on June 19 2009.

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 (民 98 年 b)，**宗教教務概況**。Available online:

<http://www.stat.gov.tw/ct.asp?xItem=15476&CtNode=3684>. Retrieved on June 19 2009.

余德慧 (民 74 年)，**台灣民俗心理輔導**。台北：張老師出版社。

張老師月刊 (民 69 年)，民俗心理輔導。**張老師月刊**，6(6)，12-38。

張珣 (民 85 年)，民俗醫療與文化症候群。**歷史月刊**，1 月號，50-54。

- 劉珠利 (民 96 年), 協助受創傷女性復原的新潮流—著重宗教與靈性的社會工作實務, **社區發展季刊**, 第 117 期, 頁 98-129。
- 盧世敏 (民 86 年), 從身心症談到民俗醫療。弘光醫專學報, 29, 357-363。
- 釋宗惇、陳慶餘、釋惠敏 (民 96 年), 臨床佛教宗教師在安寧緩和醫療中的角色。生死學研究, 第五期, 頁 65-97。
- 瞿海源 (民 88 年), 解嚴, 宗教自由, 宗教發展。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Taiwan in the post-Martial Law Era, Taipei, Taiwan.
- Allen-Meares, P. (1998). The Interdisciplinary Movement.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4, 2-5.
- Banks-Wallace, J. & Parks, L. (2004). It's All Sacred: African American Women's Perspectives on Spirituality.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5, 25-45.
- Berkel, L. A., Constantine, M. G., & Olson, E. A. (2007). Supervisor Multicultural Competence: Addressing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Issues with Counseling Students in Supervision. **The Clinical Supervisor**, 26(1/2), 3-15.
- Bronstein, L. R. (2003). A Model for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Social Work**, 48(3), 297-306.
- Canda, E. & Furman, L. (1999). **Spiritu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New York: The Pree Press.
- Colarossi, L. & Forgey, M. A. (2006). Evaluation Study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Work and Law Curriculum for Domestic Violen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42(2), 307-323.
- Cnaan, R. A. & Boddie, S. C. (2002). Charitable Choice and Faith-Based Welfare: A call for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47(3), 224-235.
- Connor, K. M., Davidson, J. R. T., & Lee, Li-Ching (2003). Spirituality, Resilience, and Anger in Survivors of Violent Trauma: A Community Survey.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6(5), 487-494.
- Fellin, P. (2000). Revisiting Multiculturalism in Social Work.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36(2), 261-278.
- Freeman, D. R. (200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piritual Development and Ethnicity in Violent Men. **Social Thought**, 20(1/2), 95-107.
- Fukuyama, M. A. & Sevig, T. D. (2004). Cultural Diversity in Pastoral Care. **Journal of Health Care Chaplaincy**, 13(2), 25-42.

- Funderburk, J. R., Fukuyama, M. A. (2001). Femin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Spirituality: Convergent and Divergent Forces in Psychotherapy. **Women & Therapy**, 24(3/4), 1-18.
- Hage, S. M., Hopson, A., Siegel, M., Payton, G., & Defanti, E. (2006). Multicultural Training in Spiritual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 **Counseling and Values**, 50, 217-234.
- Heyman, J., Buchanan, R., Musgrave, B., & Menz, V. (2006). Social Workers' Attention to Clients' Spirituality: Use of Spiritual Interventions in Practice. **Arete**, 30(1), 78-89.
- Hodge, D. R. (2005). Spiritual Lifemaps: A Client-Centered Pictorial Instrument for Spiritual Assessment, Planning, and Intervention. **Social Work**, 50(1), 77-87.
- Jimnez, D. S. & Holland, C. D. (2004). **Multicultural Spiritual Assessment: A Public Hospital Social Service Fun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NACSW Convention, October, Reston, Virginia, U.S.A.
-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1996). **Social work speaks**. Washington, DC: NASW Press.
- Quinney, A. (2006). **Collaborative Social Work Practice**. UK: Learning Matters Ltd.
- Ringel, S. (200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the Evangelical Community: Faith-Based Interven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Religion &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27(4), 341-360.
- Saxon, J. L. (2004). Faith-Based Social Services. **Popular Government**, Fall, 4-15.
- Sheridan, M. J. (1992). Practitioners'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toward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ssues for Education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28(2), 190-204.
- Sheridan, M. J. (2004). Predicting the Use of Spiritually-Derived Intervention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Survey of Practitioners. **Journal of Religion & Spirituality in Social Work**, 23(4), 5-25.
- Schiele, J. H. (1996). Afrocentricity: An Emerging Paradigm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Social Work**, 41(3), 284-294.
- St. Joan, J. (2001). Building Bridges, Building Walls: Collaboration between Lawyers and Social Workers in a Domestic Violence Clinic and Issues of Client Confidentiality. **Clinical Law Review**, 7, 403-467.
- Stewart, C. & Koeske, G. (2006). Social Work Students' Attitudes concerning the Use of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Interventions in Social Work Practice. **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 26(1/2), 31-49.
- Sue, D. W., Carter, R. T., Casas, J. M., Fouad, N. A., Ivey, A. E., Jensen, M., LaFromboise, T.,

- Manese, J. E., Ponterotto, J. G., & Vazquez-Mutall, E. (1998).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Tangenberg, K. M. (2005). Faith-Based Human Services Initiatives: Consider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and Theory. **Social Work**, 50(3), 197-206.
- Walsh, M. E., Brabeck, M. M., & Howard, K. A. (1999). Interprofessional Collaboration in Children's Services: Towar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hildren's Services: Social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4), 183-208.
- Yip, Kam-shing (2005). Taoistic Concepts of Mental Health: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with Chinese Communities. **Families in Society**, 86(1), 35-45.